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经济学（第一辑）

经济思想史 (二册)

〔美〕威廉·A·斯科特 (William A. Scott) 著 李炳焕等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Press

主編 李天綱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民國西學要籍漢譯文獻 · 經濟學（第一輯）

經濟思想史 （一冊）

〔美〕威廉 A·斯科特（William A. Scott）著 李炳煥等 譯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思想史/(美)斯科特(Scott, W. A.)著;李炳焕等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李天纲主编. 经济学)
ISBN 978-7-5520-1149-4

I. ①经… II. ①斯…②李… III. ①经济思想史—西方国家IV.
①F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5489号

经济思想史(1-2册)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永正彩色分色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厂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字 数: 420千字
印 张: 40.25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1146-4/F.345 定价: 186.00元(1-2册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一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1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三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形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仔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美〕威廉 A·斯科特 (William A. Scott) 著 李炳煥等 譯

經濟思想史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

譯者序

人類一切思想全是實際生活的反映，經濟學說當然也逃不了這個公例。如果我們忽略了歷史背景，而專憑空漠的思索，那就不特空費了研究的心力，恐怕還要走入歧途，發生誤解的危險。重商主義側重金銀和入超，實為由自然經濟進展到貨幣經濟的過渡時期中所必有的現象，而重農主義則顯係柯爾伯（Colbert）干涉政策和農村崩潰的反響，至于古典學派，歷史學派，社會主義和奧國學派的經濟思想也各有其特殊的經濟背景。卜克（Boucke）在他的名著經濟學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中說道：「思想史並非歷代相傳的一條連續線，每個時代各有牠的特殊社會組織，所以思想也跟着發生變化。」我們研究經濟思想史必須探討經濟制度的沿革和經濟狀況的變遷。

至于經濟學家派別的紛歧，往往由于各學派哲學基礎的不同。古典學派揭放任主義，實導源于孟德斯鳩（Montesquieu）和盧騷（Rousseau）的哲學。亞丹斯密（Adam Smith）和呂嘉圖（Ricardo）把經濟生活看做靜態的，所以認私有財產為不變的經濟制度。歷史學派經濟思想的結構則以康德（Kant）的哲學為柱石。羅希爾（Roscher）和希德布蘭（Hildebrand）認經濟生活為動態的，因而把經濟制度和經濟學說看做特殊歷史發展的產物。馬克思主義（Marxism）的理論體系根據黑格兒（Hegel）的辯證法，馬氏以為社會的演進，係由于正負兩種勢力互

相消長而產生綜合的結果，他又深受了費爾巴（Feuerbach）的唯物論的洗禮，相信社會各種形態，不外物質，除了具體現象和牠的反映以外，無所謂精神，至于人們一切的意志完全由物質支配。

爲着歷史背景和哲學根據的不同，經濟學家的觀點往往互相歧異。同是勞力價值說，却分爲亞丹斯密的勞力耗費說（labor expenditure theory），呂嘉圖的純粹勞力成本說（pure labor cost theory），和馬克思的社會必需的勞力數量說（socially necessary labor theory）。即就利息說而論，也產生了賽伊（Say）的生產力說，施尼爾（Senior）的節約說，賓巴衛克（Bohm-Bawerk）的時差說和馬克思（Marx）的機奪說，各派聚訟紛紛，莫衷一是。我們除非把時代背景和哲學體系，仔細研究一下，絕對不會明瞭這五花八門的經濟學說。

西洋經濟思想史中，以闡明經濟學說與哲學體系著名的，有斯班（Spann）的經濟學史（History of Economics），斯氏不僅指出經濟理論邏輯上的聯繫，並且進一步來探求各派學說的哲學基礎。他力倡全體主義（Universalism），全書結構縝密，思想一貫，怪不得其轟動一時，被推爲名貴之作。不過斯氏敘述各派學說，或詳或略，往往以自己的意見爲標準，其討論數理學派僅佔兩頁，即此一端，已足窺見斯氏的偏頗。季德（Gide）和列斯特（Rist）的經濟學說史（Histoire Des Doctrines Économiques）以批評深刻見稱。季氏所倡的連帶責權主義（solidarity）爲合作運動的基本思想，但是季氏的原著係在一九〇九年出版，對於大戰後新興的經濟思潮未能敘及，至于學說產生的背景也和西班牙一樣非常忽略。殷格蘭（Ingram）的經濟學史（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對於各時代經濟狀況，雖有

相當的注重，然而祇敘述到歷史學派為止，不無遺憾，後來史改特（W. A. Scott）附加奧國學派一章，始稍完備。（一九一五年新版。）史改特于一九三三年發表經濟學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一書，實為空前的鉅著。史氏特別注重經濟思想的背景，其書包羅各派經濟學說，舉凡重商主義，重農主義，古典學派，歷史學派，社會主義，奧國學派，數理學派，制度學派和統計學派，應有盡有，蒐集之完備，材料之新穎，見解之高超，真是有口皆碑，有目共賞了。史改特為着這部著作而思索，而研究，而講授，而修正，歷時四十年之久，博引繁徵，參稽互考，所披覽的書籍不勝枚舉，史氏討論經濟學說時，常引證原文，並加附註，全書編製極有條理，批評尤具卓識。

我教授經濟思想史，前後凡八年，課本屢次更換，總沒有得到適當的教材。前年讀了史改特原著，愛不釋手，因與黃澹哉女士和黃俊升君合譯。更名為經濟思想史。我們所譯的底稿，曾為復旦大學經濟思想史學程的講義，每週除講授兩小時外，另以一小時討論，凡學生對於講義有不明瞭之處，特標明記號，課後即行訂正，後來我又將原文與譯文逐句對照，仔細修改，務使譯筆通暢，能曲達作者之意，我為着整理譯稿，又費了半年工夫，但是疏漏之處，仍不能免，盼望讀者指正。

本書德文名詞由賀良先生繙譯，法文譯名則由劉晉銓先生校正，在譯事進行時，屢承孫寒冰先生的指示與督促，而每章脫稿之後又蒙學友徐君適門多方糾正，這是我們應當感謝的。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李炳煥序於江灣復旦大學

著者原序

著者本四十年作研究生和大學教授的經驗，寫成此書，這經驗增強了早年的見地，就是經濟學家的最好的，也許最主要的訓練，是經濟學的歷史的研究。在他的發展中，經濟學已經過了幾個階段，在每一階段之內，過去的思考常被那時的經濟和社會狀況以及各方面的思想所影響。因此任何時期之經濟思想的單獨原則與體系的意義、範圍和限度，祇有從歷史的觀察纔能了解。

以歷史的觀點去研究經濟學的學者遇到了一大批的著作，可是他僅能研究其中的一小部分，對於他所讀的怎樣去作適當的選擇和參透意義正是他的問題。在選擇的過程中，他雖然得到史籍的幫助，但是祇有獨具炯眼的人纔能採取適當的材料。尋常的學者讀了史籍茫無頭緒，雖則其中分門別類和着眼點各有不同，而他所要注意的這些歷史中，著作家和書籍有這麼多，簡直使他頭暈腦脹，往往得不到全部的透視，使他能集中心力于經濟學上最重要的和最有意義的而略去其他的材料。

排除這種困難須借助于許多學說史，而非著作家和書籍所能為力，但是即使有這些學說，也很少取材宏富的，並且因為他們必須從上下文中分割出來著作家的一種或多種學說，他們往往留下不完備和曲解的印象。

這一本書應用了排除研究者困難之另一方法。這就是把所研究的題目集中於英國古典學派經濟學的發展，而

考慮第一、前時期的經濟生活和思想的背景；第二、古典學派經濟學本身的發展；第三、古典學派經濟學的初期的批評；第四、新古典學派改造經濟學的企圖，包括這些企圖的時人、時代和批評。在每一個主要的節目中，只選擇了代表和顯名的著作家以資討論，其餘的或完全省略，或在和前者的關係中加以討論。這樣或可望較優的全部配合得告成功，和同時的歷史比較起來，對於經濟學的主要著作家和學說有更充分更完備的討論，並且所討論的著作家和學說的數目已減少到尋常研究者在相當期間內所能了解的範圍。這書更仔細討論經濟學發展中的主要階段所屬的時期中經濟生活的顯著的特點，而占有比普通多些的篇幅。

論述的方法是儘量客觀的，目的在於把所討論的著作家的思想正確地表現出來，並不在於表現著者對於這種思想的反應。爲了這種目的，就應用了許多引證，並且特別爲了注重要點而採用了許多評論，在同一著作的前後幾段的引證中有很長的刪節時，則在刪節之前用了引號。

此書的編製是多年同現在散居全世界的千數百個學生在課室內的和個別的討論的結果，此書的出版大部分是由於他們許多人時常表示的需要，特別是那些在學術界中的人，希望這些討論的主旨成爲可以供給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學生應用，著者對於這些學生的建議和批評表示感謝。

第一編

古典學派經濟學的背景

目次

第一章 導言.....	一
-------------	---

第一編 古典學派經濟學的背景

第二章 重商主義.....	三
---------------	---

一 重商主義當作一種國家政策.....	三
---------------------	---

二 英國的重商主義.....	四
----------------	---

三 其他國家的重商主義.....	一二
------------------	----

四 重商主義的學說.....	一三
----------------	----

第三章 法國重商主義的反動.....	二四
--------------------	----

一 泰恩對於當時情形的敘述.....	二四
--------------------	----

二 思想界的革命.....	二八
---------------	----

三 重農主義者的精神上的先驅.....	二九
---------------------	----